

· 论 坛 ·

## 试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对 女权运动的影响<sup>\*</sup>

李艳枝

**内容提要** 伊斯兰复兴是当代土耳其社会的突出现象，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废除头巾禁令的过程，为妇女争取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伊斯兰政党通过动员妇女参与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为她们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伊斯兰非政府组织通过关注妇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拓展女权运动的范围。伊斯兰复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土耳其女权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思潮 伊斯兰复兴 女权运动 头巾争论 伊斯兰政党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

**作者简介** 李艳枝，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沈阳 110036）。

经过凯末尔现代化改革的洗礼，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世俗化和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凯末尔主义者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将培养全新的妇女意识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步骤，在法律层面对妇女的角色、权利和地位给予明确界定：1926 年民法宣布多妻制为非法，规定了最低结婚年龄，给予妇女离婚和继承财产的权利；1935 年宪法修改案赋予妇女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此背景下，诸多妇女摆脱传统的家庭生活束缚进入公共领域，通过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为消除性别歧视、废除男权压迫、争取自由权利、改善生活状况而斗争，从而使其权利和地位得到一定保障。随着伊斯兰复兴

---

<sup>\*</sup> 本文系 2009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为 2009JJD770023）的阶段性成果。

运动的兴起，凯末尔主义所确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受到冲击，出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与凯末尔女权主义者的分野。尽管她们的政治立场存在较大区别，但都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而奋斗，这直接促使诸如“紫屋顶妇女庇护基金会”<sup>①</sup>（Purple Roof Women's Shelter Foundation）、“妇女团结基金会”（Women's Solidarity Foundation）等女权保护机构的成立，并使民法修正案<sup>②</sup>在2001年顺利通过。但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基于伊斯兰教对女性自由和权利的约束，认为伊斯兰复兴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回归，必将迟滞女权运动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来说明其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伊斯兰主义者通过支持妇女争取戴头巾的权利、动员妇女参与政党选举和政治治理、支持成立妇女非政府组织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耳其女权运动的进步。

## 头巾争论对女权运动的影响

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传统源于“妇女必须遮住她们的羞体以防止男人观看”的伊斯兰原则。妇女坚持戴头巾既显示穆斯林的宗教虔诚，又代表着对伊斯兰信仰的遵循和践行，因而围绕妇女戴头巾展开的争论甚至斗争被视为伊斯兰复兴的重要表现，妇女也通过争取戴头巾的努力获得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为了实现与传统的彻底割裂，达到构建新生共和国的目的，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通过西方化改革实现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凯末尔主义者并没有明确立法废止头巾，但却对佩戴头巾给予严格限制。多党制启动后，随着官方对宗教控制的放松，戴头巾的妇女日益增多。不过，世俗当局仍然认为头巾是破坏世俗共和国和建立类似伊朗神权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标志，明确规定禁止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关中戴头巾，所以头巾成为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斗争的重要载体。1980年政变之后，军人政府通过了针对公职人员的《服饰和衣着法》：禁止男人蓄胡须、

---

<sup>①</sup> Yesin Arat, “Feminist, Islamist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Turke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9, No. 1, 1998, p. 122.

<sup>②</sup> 2001年的民法修正案提升了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降低了男人作为家长的角色功能，强调了婚后男女平等的财产权利。就法律意义而言，土耳其的女权运动远远走在其他中东国家的前面。

留长发，禁止妇女穿超短裙、戴头巾。1983年，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了严禁在大学校园戴头巾的法规，规定戴头巾的学生不能听课和参加考试，国家安全委员力挺此法规，并在1984年宣称“我们中一些接受足够多教育足以抵制传统社会环境和习俗影响的妇女仍然戴头巾，这是反对世俗共和国基本原则的表现，表明她们接受了一个宗教国家的理想。对她们而言，头巾不再是一种天真的习惯，而是反对妇女解放和共和国基本原则的世界观的象征……因此，鉴于她们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并不摘掉头巾，以违反国家世俗主义原则的口实将其开除并不与法律相抵触。”<sup>①</sup> 此举非但未能平息有关头巾的争议，反而使矛盾激化，迫使当局着手制定相应政策来处理该问题。1988年，祖国党主导的议会通过了给予大学生穿着、包括戴头巾绝对自由的立法，但埃夫伦总统否决了该法令，认为服饰的绝对自由违背了阿塔图尔克的基本原则，宪法法院也认为允许在大学中戴头巾将会激发宗教冲突，威胁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破坏公共秩序。“服饰法并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穿着的问题。世俗主义是一种意识的转化，这是一个现代的健康的社会所必需的。个人是内在和外在生活、情感和思想、身体和精神的统一。服饰是反映个人性格的途径……特别是宗教服饰，由于其与世俗主义原则相冲突，是不和谐的。”<sup>②</sup> 因此，该法令最终并没有获得通过。

20世纪90年代的头巾争论与伊斯兰政党的执政联系密切。戴头巾的妇女作为支持繁荣党的重要力量，为宣传其竞选纲领积极奔走，为争取其选举胜利摇旗呐喊。1997年初，军方迫使繁荣党——正确道路党联合政府下台，明确宣称取缔头巾和斗篷，此举遭到部分伊斯兰女权主义者的反抗。1998年秋，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求所有大学遵循服饰法，禁止学生和教师戴头巾和留胡须，违反该规定的校长将被解职。为了抗议该规定，成千上万名学生及其支持者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埃拉泽省，举行手拉手的游行，要求军方尊重民众的信仰和思想自由。结果是，军方逮捕了500名女生，并诬称6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戴头巾的女生阴谋叛乱。面对军方的强硬措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阿亚努尔·丹尼瑞尔（Aynur Denirel）宣称“我们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徘徊”

---

<sup>①</sup> Ahmet T. Kuru, “Reinterpretation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147.

<sup>②</sup> Ibid., p. 148.

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家将不得不解决该问题，因为她们已经看到人民在支持我们。”<sup>①</sup> 政治领域的头巾冲突终于激化为米尔维的头巾事件<sup>②</sup>。这说明头巾冲突已经成为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伊斯兰主义者试图通过戴头巾使得伊斯兰象征在公共层面获得认可。

带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戴头巾的自由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埃尔多安总理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抱怨，由于女孩不能戴头巾，他只好把女儿送到美国上学。外交部长居尔的夫人曾为争取戴头巾的自由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后由于担心这一举动影响丈夫的政治前途而撤诉。正义与发展党的议会发言人布伦特·艾瑞克（Bulent Arinc）主张妇女可在官方场合戴头巾，并曾与戴头巾的妻子一起到机场为参加北约峰会的塞泽尔总统送行，此举被世俗主义者视为挑战国家安全和世俗原则。塞泽尔总统为了弥合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宣称在私人生活中戴头巾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在国家机构中戴头巾则是对世俗主义的威胁，“允许在政府部门戴头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宪法精神。”<sup>③</sup> 在2003年的第80个国庆日欢迎会上，塞泽尔总统没有邀请那些戴头巾的议员妻子，正义与发展党议员联合抵制了会议，部分议员甚至将他们的邀请函退还给总统。塞泽尔总统回应说“这是一个国家招待会，而非个人的邀请，共和国的原则记录在宪法中，”因而决定是不能改变的。<sup>④</sup> 在200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祝词中，塞泽尔声称“头巾问题是以民主的名义激发的，但其除了给土耳其民主进步投下阴影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以民主与社会和平的名义，我们不能允许某些政治组织以人权为借口来利用宗教和意志自由，宗教和意志自由的真正捍卫者是世俗主义原则。”<sup>⑤</sup>

---

① Marvine Howe, *Turkey Today: A Nation Divided over Islam's Revival*, US: West view Press, 2000, pp. 109 - 110.

② 1999年大选中，戴头巾的美德党成员米尔维·卡瓦克希（Merve Kavakci）当选为议员，当卡瓦克希戴着头巾参加新任议员的宣誓仪式时，坚持世俗主义立场的议员迫使其在宣誓之前离开议会，随后土耳其官方剥夺其议员资格，以其曾经与美国人结婚为口实剥夺其公民权资格。与此同时，其他戴头巾的女议员也遭到清理，这使得美德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更加减少。

③ Muammer Kaylan, *The Kemalist: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ate of Secular Turkey*, *The Kemalist: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ate of Secular Turke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5, p. 418.

④ Ibid., p. 419.

⑤ Ibid., p. 444.

不过，世俗主义者也认识到一味地否定戴头巾的权利并不会带来长治久安。土耳其《国民报》主编麦赫迈特·耶尔玛兹（Mehmet Y. Yilmaz）曾说“土耳其必须克服该问题和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论你喜欢与否，我们国家有几百万的妇女戴头巾，还有几百万的妇女不想遮掩他们的头部。谁都没有权力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强加给他人，如果我们不能打破心中的墙，我们将会失去21世纪，就像我们失去18、19、20世纪一样。”<sup>①</sup>这说明世俗主义者也试图改变一味反对戴头巾的立场。经过多方共同努力，2008年2月9日，土耳其议会以411:103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禁止妇女在大学里戴头巾的禁令，后经总统居尔签署后生效。尽管部分世俗主义者认为此举违反了世俗原则，甚至有数万人在安卡拉游行抗议该修正案，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经历短暂动荡之后仍然平稳执政，这说明废除头巾禁令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自伊斯兰复兴以来，头巾便成为承载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斗争的小小载体。不过，在现代土耳其社会，头巾越来越演化为一种消费文化，更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宗教象征而存在。所以说土耳其妇女争取戴头巾的权利已不仅仅是对宗教传统的遵循，而具有了更强的现代意义，伊斯兰政党也多从保护民众权利的角度来论证和捍卫戴头巾的自由。不过，部分极端的世俗主义者仍然将妇女戴头巾视为宗教蒙昧主义的表现，将其视为现代化的最大威胁。坚持凯末尔主义立场的女权主义者艾瑞特（Necla Arat）曾经指出“戴头巾的妇女不能也不想与落后的过去决裂，他们试图维持传统的附属性地位，以摒弃共和国所赋予她们的权利……现代世俗倾向的妇女不能用一块包头巾赢取她们的尊严和享受平等的受尊敬的公民权。”<sup>②</sup>可见，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头巾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尽管头巾的恢复在世俗主义者看来是保守落后的标志，但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则是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手段，是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妇女拥有戴头巾的权利，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和自我选择，头巾的恢复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道德沦丧和全盘西化的无声抗议。伊斯兰复兴使得头巾重新回归社会，并被赋予全新的象征意义，它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重新掀起回归民族传统文化

<sup>①</sup> Muammer Kaylan, op. cit., p. 419.

<sup>②</sup> Burcak Keskin Kozat, "Entangled in Secular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Islamism: the Life of Koncakuris", *Cultural Dynamics*, Vol. 15, No. 2, 2003, p. 193.

的浪潮，并在具体的应用实践中释放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意义。所以说，伊斯兰主义者借助头巾这个载体为妇女争取到更多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复兴拓展了女权运动范围。

## 伊斯兰政党对女权运动的影响

伊斯兰复兴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复兴的主要载体。凯末尔主义的精英特征决定其仅仅在国家的核心区域产生较大影响，而在边缘区域和边缘群体中间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尤其是在伊斯兰传统较为浓厚的安那托利亚地区，宗教意识仍然是维系民众认同的重要纽带。多党民主制的开启使得边缘区域逐渐被纳入政党的宏观视野之内，所以尽管伊斯兰教仍然是被压制的对象，但得到边缘群体支持的伊斯兰政党却通过民主选举进入到国家政权核心，边缘区域的妇女也借助政党选举的有利时机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

20世纪70年代，成立不久的伊斯兰政党——民族拯救党借助安那托利亚民众的支持，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11.8%的支持率，顺利进入联合政府。民族拯救党中67.2%的支持者来自农村，32.8%来自城市；对其支持率最高的10个省份中，有9个位于中东部安那托利亚地区，而且这些省份的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sup>①</sup>，这充分说明民族拯救党主要在经济相对落后、宗教意识相对浓厚的地区获得支持。民族拯救党在1973年大选中的胜利一方面体现了边缘区域与中心区域的整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伊斯兰政党对边缘区域民众的动员，就动员的范围、层次和水平而言远远超过其他政党。借助多党选举的有利时机，边缘地区妇女的声音出现在政党角逐的舞台，其投票也影响了选举结果，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统计数据，民族拯救党对妇女的影响抑或她们对伊斯兰政党得票率的影响难以估测。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伊斯兰政党开始积极动员妇女参与政党政治和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繁荣党成员、伊斯兰女权主义者西博尔·艾若珊（Siber Erasan）在1994年地方选举和1995年全国大选中，积极动员妇女投票支持繁荣党。不过，这些投票支持繁荣党的妇女并没有分享权力的渴

<sup>①</sup> Binnaz Toprak,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E. J. Brill, 1981, p. 109.

望，她们试图通过广泛的民主动员和政治宣传来为男人的选举胜利积极奔走；她们也不像西方女权运动中的妇女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男性主导和统治，而是出于支持伊斯兰教所传导的正义制度。因此，在繁荣党获得选举胜利后，伊斯兰精英分子并没有将妇女视为平等伙伴，也没有在政府机构给予妇女任何职位。当繁荣党公布其清一色的男性政府成员时，艾若珊愤然辞去繁荣党妇女领导人职务，坚持认为妇女应该在政党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建联合政府后，阿亚瑟·多甘（Ayse Dogu）指出“繁荣党斗争的目的是掌权，我们（戴头巾妇女）是为自己的身份而斗争。作为一个因繁荣党浅薄而不认可其世界观的穆斯林妇女，我相信个人意识、选择和行动，而非机构、组织和政党。我所恐惧的是植根于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反动心态将是解放我们的社会障碍。”<sup>①</sup>这说明她们将女权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但就斗争实质而言，女权运动仍然是政治斗争的附属物。不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范围的拓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妇女借助政党政治逐渐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尽管繁荣党执政时期妇女的政治参与仍然遭到一定限制，但却为正义与发展党时期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铺平了道路。

正义与发展党对女权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吸收女性担任政党、政府甚至议会领导人，可以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是妇女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时期。根据相关统计数字<sup>②</sup>，虽然此时各个层次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仍然相当低，但是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sup>③</sup>随着将“反对任何形式的针对妇女的歧视”写入党纲中，正义与发展党也在实践中摒弃了那些涉嫌歧视妇女的行为，还在提升妇女教育水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正义与发展党主政的教育部在2003~2005年发动了一场“女孩上学”的运动，旨在教育方面促进性别平等，运动波及全国30多个省。针对家庭暴力问题，正义与发展党也宣称他们正在寻求解决家庭暴力的方法。2006年，妇女地位办公室实行所谓的“反对妇女暴力”的计划，收集与家庭暴力和语言暴力有关的数据，以寻

<sup>①</sup> Yesin Arat, op. cit., pp. 125 - 126.

<sup>②</sup> See Edibe Sozen, "Gender Politics of the JDP",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263.

<sup>③</sup> 在34 044名市政议会的成员中，有540名妇女，占总数的1.6%。在3 215名市长中，有20名女市长，占0.6%。在3 122名地方议会中有21名是妇女，占0.7%。妇女在大国民议会中的比例从上一阶段的3.8%上升到目前的4.4%。

求最终的解决方法，该计划还得到欧盟的资助。正义与发展党取得的另一项成就是清除刑法中关于通奸的条款，其中规定性犯罪属于个人犯罪。正义与发展党还重新规定了女工的产假期限。<sup>①</sup>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妇女无论在政治参与，还是在个人权利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使妇女获得了进一步解放。

总之，土耳其的政治话语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并给予法律意义上的明确规定，妇女也在推动政党选举的完善和政党上台执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政党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将边缘区域的妇女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实现了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域的整合，以及较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正义与发展党将女权运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动员更多的妇女参与政治而使她们的需要得以表达，从而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伊斯兰政党自身也经历了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从早期排斥西方与世俗主义者，到后期与西方及世俗主义者友好相处，体现了整合传统与现代的积极努力。而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和世俗女权主义者也为争取共同的权利和自由做了许多工作，因此，土耳其的妇女解放并非单单是伊斯兰政党影响的结果。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通过发展妇女组织和吸收女性议员，充分发挥了妇女在政治中的核心决策作用，将妇女的政治参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有目共睹的成就。不过，就目前土耳其民主化发展程度而言，男人仍然是民主选举的最大受益者，大部分妇女并没有充分享受政治赋予的平等权利，而且妇女在政治自由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妇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解放妇女仍需要伊斯兰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共同努力。

###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对女权运动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是现代化的产物，是公民社会的主要构成力量，其建立发展过程是边缘化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其发展壮大使不同声音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为妇女解放提供有利条件。在共和国早期，奉行凯末尔主义的妇女团结在妇女联盟的周围。多党民主制启动之后，

---

<sup>①</sup> 即将妇女带薪的产假延长至16周——产前8周、产后8周；多胞胎为18周，第一年每天有1.5个小时的哺乳时间；不带薪的生育假期是6个月。



奉行凯末尔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相继成立了一系列女权组织<sup>①</sup>，为女权运动的发展积极奔走。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sup>②</sup>，一些具有鲜明伊斯兰色彩的女权非政府组织开始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反歧视妇女组织（AK-DER）、争取思想和教育权利与自由协会（OZGUR-DER）、实现被压迫者人权和团结的组织（MAZLUM-DER）。这些组织对女权运动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反歧视妇女组织成立于1999年2月15日，成员为曾经遭受歧视的、具有伊斯兰倾向的女学生、女律师、女医生和女教师，他们主要关注人权、法律自由与和平等主题，并为获得戴头巾的权利而努力。该组织倾向于阻止人权滥用和歧视现象的发生，并着重关注公共视域内与头巾相关的问题。他们宣称“我们属于那些臣服于真主的自由者，我们既不压迫任何人，也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土耳其是一个‘瓶子’，伊斯兰生活方式和西方化生活方式类似于瓶中的橄榄油和水，共和国的行政官员经常晃动该‘瓶子’试图混合这两种生活方式。但是在这种实践中，他们误导了土耳其，他们取缔头巾即是一个重要的例子。”<sup>③</sup> 尽管反歧视妇女组织极力摆脱与伊斯兰政党的关系，该组织领导人也宣称她们与美德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她们关注的是在公共领域妇女戴头巾的问题，并不关注政治代表权的问题，她们希望保护的只是妇女的个人权利。不过，这显然是托词，如果没有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其鲜明的伊斯兰色彩并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其争取戴头巾的努力也不可能获得伊斯兰主义者的认可。

争取思想和教育权利与自由协会于1999年3月8日在一次新闻研讨会上宣告成立，其成立章程声称该组织旨在扩大土耳其高等教育机会，以及向学生通告宪法、法律和国际协议中有关教育权利的内容，该协会主席宣称其目的在于为那些戴头巾的学生铺平获得教育权利的道路，所以头巾问题也是她们关注的焦点。参加该组织的妇女非常关注她们的伊斯兰身份，并不掩饰她

---

① 例如，土耳其妇女联盟（Turkish Women's Union）、妇女社会生活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to Research Women's Social Lives）、阿塔图尔克思想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tatürkist Thought）、支持现代生活协会（The Association to Support Modern Life）、反隔离的妇女权利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Women's Rights Against Separatism）和被压迫民众人权和团结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Solidarity for Oppressed People）。

② 相关研究参见李艳枝《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19~24页。

③ Ayşe Kadioglu, "Civil Society,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A Study of Three Islamic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5, January 2005, pp. 29-31.

们争取戴头巾的权利，甚至公开追求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她们经常讨论阅读《古兰经》以及与真主相遇时的情景。她们认为所谓的自由之路是通过信奉《古兰经》来实现的，因而自由并非源于理性而是信仰，这也是她们主张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来改变社会的原因。她们宣称“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组织，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与政党保持联系，影响他们的政治纲领，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告知人们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歧视，通过激发她们的意识而实现社会的转变。”<sup>①</sup> 所以，她们认为政治是赢取民众心理和转变社会的斗争。她们还公开反对一些非道德的行为方式，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声称“我们将不会与任何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运动站在一起。”<sup>②</sup> 显然，一方面，她们公开为禁止和取消所有限制土耳其教育权利的禁令而斗争；另一方面，她们也公开承认基于伊斯兰道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高等学校取消头巾禁令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基础和存在的理由。

“实现被压迫者人权和团结组织”是一个成立于1991年的人权组织，其宣传口号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反对压迫者”，除了在安卡拉设立总部之外，还有15个分支机构，该组织领导人认为其伊斯兰身份并非自我界定，而是大众传媒赋予的称号。1997年，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国家面临伊斯兰威胁为由迫使繁荣党下台，并实施的一系列严苛措施在公共层面阻止伊斯兰教的存在，“实现被压迫者人权和团结组织”认为这违反了基本的人权。该组织主要关注头巾问题、亚美尼亚人和其他非穆斯林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妇女歧视问题、失踪人口问题、非正常死亡和监狱中违反人权行为等，该组织主席曾说“即使是吉普赛人的权利被违背，我们也会坚定的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站在被压迫者的一方反对压迫者，但是我们尽力避免等同于我们所保护的被压迫者身份，作为保护人权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以国际人权为基础来为自己的活动提供合法性基础。”<sup>③</sup> 该组织对头巾问题给予充分关注“难道头巾在土耳其仅仅是妇女的事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其认为存在比头巾问题更为严重的针对妇女的歧视，所以它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要比前述两个组织更为广泛。

由以上分析可知，这3个非政府组织是在伊斯兰复兴的影响之下成立和

① Ayşe Kadioğlu, *op. cit.*, p. 33.

② *Ibid.*, p. 34.

③ *Ibid.*, p. 34.

发展起来的，其将解决妇女遭受的歧视、压迫和剥削作为斗争的目标，并努力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进而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展。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通过关注国家所忽略的社会问题，而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通过创造新的认同，寻求平等主义和民主，以使政治社会的各个机构更容易接受这些新的认同和规范，从而充分发挥了社会第三部门的功能，而这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作为伊斯兰复兴组成部分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对伊斯兰政党的执政产生重要影响，也有力地驳斥了伊斯兰教与公民社会不相容的结论，但是对于伊斯兰妇女非政府组织对女权运动的影响也不能高估。首先，伊斯兰妇女非政府组织是土耳其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组成部分，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的附属性决定其只能发挥附属功能。其次，伊斯兰妇女非政府组织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的命运深受伊斯兰力量社会地位变迁的影响。最后，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务实开放的发展方向也使伊斯兰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其他妇女组织的界限逐渐模糊，其宗教色彩日益淡化。

综上所述，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政治参与程度的扩大和自我权利选择的多样，可以说，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在客观上促进了女权运动的纵深发展，这显然是对伊斯兰复兴必定会迟滞女权运动发展的相关结论的否定。土耳其女权运动的发展与进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单受伊斯兰复兴的直接影响，而且伊斯兰教对妇女的部分限制也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并不相容，对两性隔离也使其在争取妇女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打折扣。但伊斯兰复兴背景下女权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现代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力量对共同社会问题的关注，也说明实现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是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共同追求的目标，顺应了现代化进程的终极发展趋势。由于“女权运动并不仅仅旨在为妇女夺取权力，……女权运动追求和谐平等的伙伴关系，呼吁和平合作的社会制度。”<sup>①</sup> 因此，土耳其的女权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sup>①</sup> [美国] 理安·艾斯勒著；程志民译 《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第4页。

## On the Influence of Islamic Revival over Feminist Movement in Turkey

*Li Yanzhi*

**Abstract:** Islamic revival is a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Turkish society. Islamists strive for more freedom of choice for women by the process of abolishing ban on headscarf. Islamic parties win bigger discourse space for women through mobilization of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party and democratic election. Islamic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feminist by focusing on a variety of social problems faced by women. As companion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 , Islamic revival has to some extent boosted woman's rights awareness , and thus has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Turkey.

**Key Words:** Social Thought; Islamic Revival; Feminist Movement; Headscarf Debate; Islamic Parties; Islamic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